

“人生大道”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

曹思宇

在熬过了饱受贫穷折磨的童年之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投身美国左翼社会运动，而后，她辗转欧洲近十年。1928年末，史沫特莱来到中国。这位不受教条约束的左翼记者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想要亲眼看一看中国的革命和中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坚持留在中国，采访并记录战争的进程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情况。直到1941年春天，健康原因迫使她不得不选择离开。后来史沫特莱在《中国驻地记者》(1943)中谈及这段经历对她产生的影响，表示“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将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余生”，并且还不无苦涩地补充说，“我经常忘记自己并非中国人这个事实”。



李桦《怒潮》组画之《起来》黑白木刻(1946年)

文汇报
学人
第589期



“眼前所见的中国革命便是我现在的信仰”

在密苏里北部出生的史沫特莱，父亲是在全美国四处揽活的矿工，母亲则是在有钱人家的住家佣人兼厨子。她自幼生活在洛克菲勒的“采矿区”，用她自己的话说，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公司在那里拥有“除了空气之外的一切”。或许是因为幼年时的耳濡目染，小学教育都没有完成的她后来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此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也只有一种信仰，那就是致力于穷苦人民和受压迫者的解放。正因为如此，眼前所见的中国革命便是我现在的信仰。”(《中国的战歌》，1943)要用短短几句话来还原史沫特莱传奇的一生，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通过她生平的部分经历，或许能让我们稍稍了解这位毕生追求社会公正的工人阶级斗士为何会坚定地做出上述宣言。

辍学后的几年里，史沫特莱先后做过卷烟工、速记员和女招待，然后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离开西密苏里前往纽约。她在纽约为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工作过，还被指控是“德国间谍”，并于1918年遭到逮捕和单独监禁。这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史沫特莱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憎恨。等到1919年末指控最终撤销后，史沫特莱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她在柏林寻找那份让她身陷囹圄的印度流亡者创办的报纸，并遇到了革命领袖维伦德纳特·查托帕迪亚。在与其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史沫特莱接触并研究了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在柏林，她在玛格丽特·桑格的资助下，和一群怀着进步思想的医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国立计划生育诊所。魏玛共和国政府随后接管了这家诊所，并仿照其模式，开设了另外几家类似的机构。可纳粹上台后，妇女“被勒令回到卧室去”，计划生育诊所成了极右派的眼中钉。面对希特勒的威胁，维伦德纳特离开德国前往列宁格勒科学院，而史沫特莱则于1928年在《法兰克福日报》得到了一份派驻中国的特约通讯记者的工作。

从苏联和中国接壤的东北(即当时的“满洲”地区)进入中国时，史沫特莱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她当即下了决心：“我之后的生活不能远离中国人民，要想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唯有融入他们。不然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在东北，史沫特莱很快意识到日本在铁路、政府机构、工厂和土地投资等领域所拥有的经济控制力与政治权力。她撰写了一系列记录日本在东北活动的文章，可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些文章才得以刊发并为世人所知(详见Jan MacKinnon & Steve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A Working Introduc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05 Jul 2019)。

当时的媒体要么被金钱收买了，要么被迫保持沉默。史沫特莱了解到，代表英国官方的路透社和国民党政府达成了秘密协议，核心内容是确保该新闻社每月可以获得一万美元的佣金，而作为交换，路透社必须发表对国民党有利的宣传报道。美国的新闻机构和国民党有类似的“秘密”。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期间，外国媒体不断地为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成果”高唱赞歌。可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却在报道中国进步人士(包括那些同情左翼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党员)遭到监禁的情况，他们中的很多人仅仅因为是工会成员或左翼知识分子，就被公开处决。由于史沫特

莱坚持独立公正地报道，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声称她是英国公民，嫁给了印度分裂主义分子，并且涉嫌使用了“伪造”的护照。直到经过多方努力，“后知后觉”的美国领事馆才想起自己还有保护本国公民免受英国特务机构骚扰的义务。

上海·苏联·西安·延安

史沫特莱将上海作为自己的办事处，揭露了与日本在东北公然沆瀣一气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和叛国行为。她还意识到，在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国民党员不过三万九千人。换句话说，它已经沦为了一家由政府官员及其下属组成的小型封闭公司”。工会的会费成了给国民党的“进贡”，用来镇压抗议活动。至于本应急需推行的土地改革，更是无从谈起。

1930年，史沫特莱见到了鲁迅，用她的话来说，“我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年里，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之一。”(在送给鲁迅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的扉页，史沫特莱写道：“赠给鲁迅先生，对他为一个新的社会而生和工作献上敬意。”)此后，他们联合宋庆龄女士，于1932年创立了第一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敦促国民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停止对政治犯的拷打和屠杀。但就在同一年，受到纳粹掌权的影响，《法兰克福日报》解雇了史沫特莱。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她的健康状况也开始恶化。1933年，她前往苏联和东欧。在柏林，她在玛格丽特·桑格的资助下，和一群怀着进步思想的医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国立计划生育诊所。魏玛共和国政府随后接管了这家诊所，并仿照其模式，开设了另外几家类似的机构。可纳粹上台后，妇女“被勒令回到卧室去”，计划生育诊所成了极右派的眼中钉。面对希特勒的威胁，维伦德纳特离开德国前往列宁格勒科学院，而史沫特莱则于1928年在《法兰克福日报》得到了一份派驻中国的特约通讯记者的工作。

1936年春，她回到了上海。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友人建议她前往西安治疗，结果反而幸运地获得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手报道资料。不久，史沫特莱动身前往延安，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红军总司令朱德见面后，史沫特莱决定为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将军写一部传记。然而，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对中国发起了全面入侵，这让她不得不中断原先的写作计划。

希望中国的战友能在自己墓前唱响新中国的国歌

战争并没有令史沫特莱退缩。她加入了红军，并于1937年9月前往正在激烈交战的绥德和察哈尔。尽管必须时刻忍受背部旧疾的折磨，她还是坚持在前线报道伤员的情况以及日益严重的饥荒和疫病，并积极呼吁各界提供医疗援助，建立流动诊所，招纳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就在史沫特莱本人也很快成了“在战线上奔波的急救员”，经常在连自己都站不稳的情况下，替担架上的士兵们做紧急治疗。在跟随红军四处行军作战期间，史沫特莱目睹了将士们抗战到底的勇气，坚信红军的革命精神必将领导和拯救中国，并为亚洲所有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事业注入一针强心剂。在抗战前线，史沫特莱完成了新书《中国在反击》，并始终没有停止朱德传

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到1938年她接到任务前往汉口组织红十字会募捐，才不得不和朱德将军分别。

在完成了汉口的任务之后，史沫特莱返回美国。由于当时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关系甚密，她的“亲共”言行招来了严厉打压。面对各种莫须有的诬蔑，史沫特莱没有屈服，始终拒绝按照当局的要求撰写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拒绝因为压力而辜负在陕北时期便结下的革命友谊。可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史沫特莱健康状况愈发糟糕，还不幸罹患了胃癌。尽管来往通信一直遭到严格的监视，她还是通过董必武给朱德将军写信。朱德在得知她的情况后感到无比痛心，想方设法给她寄去了不少信件和中国的纪念品，希望以此给她带去心灵上的慰藉。

史沫特莱一直想回中国，却屡屡受挫，无法成行。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史沫特莱孤身一人在美国，庆祝当年的战友实现了自己愿望，遥祝中国人民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1950年4月28日，史沫特莱在英国牛津进行大面积的胃部切除手术。她深知其中风险，于是在手术前立下遗嘱，要将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交给朱德将军，并希望死后能葬在中国，希望中国的战友能在墓前为自己唱响新中国的国歌。

奇迹最终没有出现。5月6日，史沫特莱因为手术失败，不幸离世。当律师将她生前留下的巨额稿费交到朱德手中时，朱德感到十分悲痛，因为红军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国际战友和同志。1951年，史沫特莱的骨灰经历诸多坎坷，终于送到了中国，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下葬仪式时，朱德和在场的所有人为这位国际战友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朱德记忆中的那条“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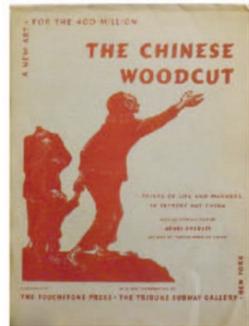
《人生大道：朱德传》是史沫特莱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她从朱德在仪陇县附近的农村庄出生写起，坚持以朱德将军的叙述视角出发，穿插结合了不少搜集查证的史料和调查报告，详细而又生动地记录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

命、北伐战争、数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胜利等一系列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值得铭记的大事件。与此同时，史沫特莱还牢牢抓住朱德这位革命领袖的个人命运线索，将国家民族命运和个人的彷徨求索紧密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感叹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有识之士是如何前赴后继地牺牲自我，为“救国图强，民族解放”这一崇高信念而投身于革命。运用自己力求公正同时又饱含真情的笔触，史沫特莱向全世界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窗口。朱德将军的讲述是真挚与坦诚的，史沫特莱也将这份质朴和坚毅的革命精神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为艰苦卓绝的革命叙事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真实感。

由于史沫特莱后期长时间无法回到中国，很多资料缺失且难以查证，因此涉及很多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的史实(包括人物姓名、部队番号、具体年代等)，存在表述不够精确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然而，瑕不掩瑜。从初到延安时起心动念要写这样一部传记，到后来在美国时期忍受病痛折磨反复核对资料并完成著作的撰写工作，史沫特莱的这部著作早就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革命领袖的个人传记，而是关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全景式史诗。

朱德曾反复提及小时候自家门口有一条“大道”。这条道路的一头连接着他懵懂的童年，一头连接着自己外出求学，继而走上革命征程的后半生。书中同样写道，“大道”上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旅人，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为了平凡的生活而奔波。可是当民族面临存亡的威胁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朱德一样，踏着这条路，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一分子。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史沫特莱提及内战的阴云正在中国的上空积聚，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为国家的前途而奋斗的人们显然没有停下脚步，仍然在这条革命的“大道”上砥砺前行。或许在史沫特莱看来，朱德记忆中的那条“大道”实际上已经延展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路的一头连接着这个民族无比坎坷的近代史，一头则指向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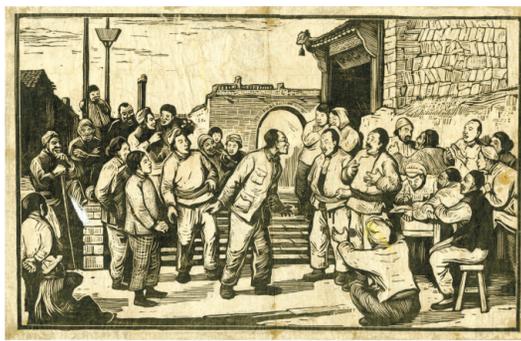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本版木刻均收入史沫特莱编选并作序的《中国木刻：四万万人民的新艺术》(Touchstone Press, 1948)封面图片源自李桦《怒潮》组画之《抓丁》黑白木刻(1946年)

古元《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案》黑白木刻(1944年)

均资料图片



幸德秋水(1871—1911)是日本最早的反帝反战士，也是东亚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导。他的著述以思想的洞见和语言的感染力闻名，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1)、评论集《长广舌》(又名《倡言社会主义》,1902)、以及《社会主义神髓》(1903)等，反映了幸德秋水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脉络。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1870年代至1945年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时代，尤其1914年之前的四十年，是欧洲资本主义达到顶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支配着世界大部分的“落后地区”，政治上，大国间的霸权争夺致使各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纷纷建立帝国。一时间，各种“大××帝国”或“泛××主义”“军国主义”“铁血主义”“民族‘爱国心’”等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追逐的时代潮流。

幸德秋水的一生恰好与这个急剧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大体重合。19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以下简称“《帝国主义》”)一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该书篇幅短小，逻辑结构简洁明晰，全书由五个章节构成。绪言部分，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流行如燎原之火”的原因进行了辨析，并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批判了帝国主义的非道德性。继之，他对“爱国心”的实质作了深层剖析，指出其时的“爱国心”既不同于“惻隐之心”，又不同于“望乡之心”，其所爱，只在浮华的名誉与利益的垄断，只是当时的政治家、军人统治者“为了一己的利益，夸饰和虚荣”而煽动起的国民动物性的发泄。而面对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民众“侮辱、蔑视乃至憎恶中国人”的“激烈程度”，幸德秋水则感触尤深，直指其“接近虎狼之心，俨然与野兽类似”。与此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日本政治家和军人在“爱国心”的名义下，“压榨国民的膏血以扩充军备，耗散生产性资本而消磨非生产性物质”致使物价飞涨和输入过剩，全然不顾人民的福祉，只为满足一己之私欲和自居大国的虚荣。第三章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论证了军国主义的社会危害，及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和摧残。第四章着重批驳了以海外殖民为方式的领土扩张行为。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变革方案，以最终实现“兄弟互助的世界主义”。

虽然在逻辑论证和体系厘然有序方面，该书远不及后来的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更不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但在帝国主义盛行一时而大帝国的建设趋向和殖民扩张已波及亚洲之际，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民族主义高涨，政治家和多数国民都沉浸于“大日本帝国”的狂热之中时，幸德秋水发出的这种反帝论述，无疑在以鲜明的立场作社会警示。而其帝国主义批判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理想，则在他个人思想和东亚社会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又有着另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思想史领域，幸德秋水不仅以其反帝反战的论点著称，而且是公认的东亚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导者。自1898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协会”和“社会主义党”建党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时起，幸德秋水即深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同一时期，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事评论文章，集结为《长广舌》，以及直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主义神髓》，体现出一种理论上的飞跃。

《社会主义神髓》不仅援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理路，以说明各个时代的经济由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呈现的不同社会形态，而且还参照《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来阐述阶级斗争、产业预备军、剩余价值、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等问题，因此被认为是日本乃至东亚最早的基于科学理论的社会主义思想范本。全书由七章组成。第三章《产业制度的进化》是重心所在，幸德秋水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在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时，着重强调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因自由竞争引发的生产无秩序，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和产业预备军的出现。继之，又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简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指出资本集中采取股份公司、同业者大同盟、托拉斯等形式，进一步发展形成垄断资本主义，而正是在这一阶段，社会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端，促成了社会的“一大转变”。

今天看来，书中的一些论述仍夹杂着一丝偏失。如第五章中，幸德秋水强调社会主义要“取消衣食的竞争，而实现智德的竞争”，然而这两者有着内在关联，很难区分彼此。又如第六章中，他认为“社会的状态经常代谢不已，犹如生物的组织进化不已

东亚社会主义之先导

《共产党宣言》最早的日译者之一幸德秋水

杨起予

一般，则是将革命看作自然和必然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其结果则不免陷于将生物进化的原理运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在这本书出版后第二年，即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为纪念《平民新闻》创刊一周年而共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日本最初的译本，一经出版便成为一个流传广泛的经典译本。虽然在出版的同时遭到政府的查封并被诉讼，但《共产党宣言》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日文版的出版，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和亚洲的传播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07年，幸德秋水开始转向“作为社会主义之组成部分的无政府主义”，并因为这一思想转向与日本社会党出现分歧而另组“金曜会”。同一时期，他将目光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希望能够实现无政府社会主义的联合。早在1901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中，幸德秋水就对日本国民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表达了明显的反感，而与这种反感相对应的，则是六年之后，他由关注中国革命而对亚洲社会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又有着另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已相继来到日本，他们因为与孙中山同盟会发生分歧而将目光转向日本的社会主义。这些中国的“新思想家”希望与幸德秋水联手推动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1907年3月，在北一辉的介绍下，双方得以结识，最终，幸德秋水与章太炎、张继等人共同组建了“亚洲和亲会”。他与东京的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交往，也使其著作迅速被翻译成多个中文版本。1907年8月31日，幸德秋水受刘师培、张继等人的邀请，赴“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会议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之组成部分的无政府主义》的演讲，表达了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愿望。

事实上，幸德秋水一直受到在日本中国人的关注。每当其有著作出版，就会很快出现相应的中文译本。如《帝国主义》出版后第二年，上海广智书局的赵必振译本便出现了；《长广舌》也是次年就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译，以《社会主义长广舌》为书名。而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则至少有四种中文译本在日本和中国刊行。此外，1906年，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创办《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全文刊出了他们重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而中文版最早的两个译本，即1908年陈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载《天义》第16—19合刊号)和1920年陈望道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都是以此日文版为主要依据。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主要依靠两个渠道，一为俄国渠道，二为日本渠道。虽然社会主义思想发源于欧洲，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社会主义在东亚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日本渠道。幸德秋水的著作以及他与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减弱。(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